

教宗信函五年後的回顧

梁作祿著 傅蔚琳譯

五年前，教宗本篤十六世寫了一封特別的信件，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反觀今天的中國教會，我們可能會比較看重她所面對的種種問題，而忘記了她正面的發展。若我們再仔細地看看自二零零七年五旬節以來，在中國教會發生的變化，我們將更明白這封由羅馬教宗寫的文件，為中國教會有甚麼深遠的意義。

今天中國的天主教會團體似乎成爲了國家機關的一個特殊目標，但這事實也反映出在政府與

教會的關係中，過往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局面，已開始清楚地浮現出來，並需要從根本處作一番檢視。教宗本篤十六世主要關注，是教會能夠「用愛的語言來說明真理」，這明確地指出中國的天主教會團體需要一個真正的皈依：「淨化記憶，寬恕作惡者，忘掉所受的委屈，……這些都是急切需要完成的。」教宗亦以溫和但明確的方式，強調目前的「宗教寬容」程度與一個現代國家所應有的「宗教自由」，仍然相距甚遠。

說到這裏，教宗希望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與

政府達到一定程度的了解，好讓屬於少數中國天主教友以和平的方式，為國家的公益作出貢獻。梵蒂岡過往的指令清楚地界分「地下」團體與支持愛國會的群體。教宗信函則是開宗明義地要求與政府當局展開「相互尊重和坦率的對話」。他深信若這些主要問題得到解決，將有助於中國邁向她所期盼的「和諧社會」。

教宗信函受到中國天主教友的歡迎

眾所周知，雖然一些非官方團體對教宗信函尚有一些保留，但中國大陸的教友群體普遍對教宗信函感到鼓舞，並視之為一縷光明和希望。政府機關最初發出的文件較為審慎，雖然當局沒有對信件發出明確的譴責，不過它很快就限制教友們研讀或分發該信件。

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報告，反映出各省的情況有顯著的不同。黑龍江省齊齊哈爾的非官方主教魏景儀（四十八歲），在收到這個「在中國教會

發展中的里程碑」後不久，就發出了一份特殊的牧函，評論信件的內容，並要求他的團體中的三十位司鐸，跟他們的信友研究如何將教宗的指令付諸實行。魏主教還報告說，在數個月後，他向齊齊哈爾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提交了一份教宗信件的副本，他們也表示讚賞。但他也承認，一些神父私下並不同意他與當局的合作。

在西北部的陝西省鳳翔教區李鏡峰主教（八十七歲）向司鐸們派發教宗信件的中文譯本，亦提交了一份予當地的政府辦公室。在過去的歷史中，他的教區沒有遭受過愛國會的嚴厲管制，而他自己亦在沒有政府的批准下，於一九八零年被祝聖為主教。二零零四年，當局在他堅拒加入愛國會的情況下仍確認其主教身份。不過他認為如果政府不接受教宗所表達的立場，事情可能會惡化：「我們知道要達成共識是多麼困難。」此外，在幾乎沒有任何地下教會團體的西安，黨明彥主教對教宗信函的積極成果感到滿意，認為這信件

使政府與教會之間的聯繫和對話更容易。

在敏感的河北省，同時獲羅馬教廷與中國政府承認的封新卯助理主教（四十四歲）說，羅馬教宗的信可以在他的衡水教區內自由傳閱。在河北省的宣化教區，有一千名天主教友出席了聖母升天節（八月十五日）的隆重彌撒，並在聖祭禮中奉獻了教宗的信，強調教宗呼籲信徒們團結一致。在同一省份，為公安部隊所熟知的非官方主教賈治國（七十五歲）在教宗信函發佈後指出，教會內的團結合十分重要，認為真正的困難來自國家對教會施加的壓力。他補充說：「現時只有政府才能限制愛國會的權力，但我很擔心我們不能對政教關係的發展期望過高，因為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的政治生態根本沒有改變過。」

一位來自中國北方的「地下」團體、現正在海外留學的年輕神父說，教宗信函「對中國教會將來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他亦同意「修和是中國教會最迫切的任務」，但教宗作為普世教會

的牧者，卻沒有在信中提及仍在監獄中受苦的主教和神父，他對此感到難過。至於官方教會的神父，雖然表示欣賞，但對內容仍有所保留。人們普遍認為，大部分中國神父、修女和平信徒都有讀過教宗的信，而且每人都得到一份複印本。

公眾反應不一

北京政府並非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收到教宗的信，因為羅馬教廷早已在公佈信件前十天，已經把信件複印了一份，並送到北京政府。在信件公佈前不久，統戰部主動召開「官方主教」的會議，警告他們對教宗的信保持「冷淡」。就在這幾天，天主教愛國會慶祝成立五十週年，舉辦了一個專題研討會，接著在六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舉行大型聚會，有五百人參加，其中包括三十七名主教。這次聚會由葉小文、劉柏年、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和統戰部部長劉延東主持。正如剛才所提到的，地方政府的即時

反應不甚一致。教宗信函很快就從天主教的網站被刪除，一些網頁管理員獲政府官員的「探訪」，「說服」他們將教宗信函從他們的網站移除。事實上，河北公安局早已在二零零八年八月，精心設計了一份文件，該文件以學習材料的模式出版，內容除了指責教宗「不顧中國的反對，單方面發出他的牧函」，接著重複過往的指控，指稱羅馬教廷把所有的責任推到中國方面。教宗的信以宗教自由的名義，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

然後，統戰部與國家宗教事務局在十月發出了嚴格的指引，形容教宗信函是梵蒂岡嘗試滲透和挑戰中國主權的行動。政府將不會容許人們公開派發信件，亦不容許在互聯網上發放，任何私人的副本將被沒收。神職人員應出席洗腦的會議，以達到恐嚇的效果。各級控制的機關應開始運作，在統戰部、宗教事務局、公安局、國家安全局及宣傳局共同參與下，加強信息的收集，了解更多地方和國內外的情況。但是，高級官員應

該保持沉默，不讓中央機關感到難堪。在同一個月，廣西自治省的新聞證實，南寧發起了對抗梵蒂岡「滲透」的活動。在附近的青秀區，一個堂區在其壁報板上發放了教宗信函的部分內容，這些壁報板遭到沒收和破壞。宗教事務局辦公室甚至成立緊急小組，成員包括超過十二個政府機構，為阻止信件的傳播，在上面標示「(梵蒂岡)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工具」。在中國各地舉辦了許多為天主教神父而召開的強制性政治會議，暫時知道被逮捕的約有十多人。

另一方面，由於奧運會在二零零八年夏季開始，國家當局顯然有意在國際層面上避免任何爭議。這可能使中央政府採取批判的態度之餘，仍然保持克制。另一種情況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第十七次大會即將召開，當它在十月十五至二十日舉行時，第一次達成了一項決議，把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準則納入黨的章程內，好使宗教界發揮積極作用，推進社會和經濟發展。然而，對

教宗信函的禁制顯然是由北京當局發出的。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甚爲不滿。他在接受《南方週末報》的訪問時（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出版），對天主教會和教宗信函作出了強烈的批評。

兩年的平靜之後，一次突如其來的衝突

到二零一零年底爲止，似乎沒有甚麼特別引起人們關注的事情發生。幾個教區重整和增加他們的福傳和牧民培育的計劃。另外，在新主教人選這個具爭議性的議題上，天主教會團體證明了他們的決心和團結，甚至覺得羅馬和北京能夠透過「民主選舉」在人選的關鍵問題上達成協議。因此，在教宗信函出版之後的幾個月，五個年輕的主教，當中包括在北京和廣州等重要城市的主教，同時獲得羅馬教廷和政府的批准而被祝聖。然後在二零零八和二零零九年，都沒有新的主教被祝聖，也許高層官員仍在討論這個困難的問題。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中旬，十位新主教被祝

聖，他們同時獲得政府和羅馬教廷的承認。

事情突然轉變過來，郭金才神父沒有得到羅馬教廷的批准，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被強行祝聖爲河北省承德地區的主教。羅馬教廷對此消息感到十分不安，並在一份公報中指出聖父對這事「深表遺憾」，但他重申願意「與中國當局展開相互尊重和建設性的對話」。不幸的是，在北京警方的大力支持下，第八次天主教代表大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至九日在北京召開，這顯示北京已經決定採取強硬的對抗政策。

情況於二零一一年進一步惡化。雖然羅馬教廷與中國當局都承認四個新的主教，但另外有兩個主教未經教宗批准就被祝聖，他們分別是六月二十九日被祝聖的四川省樂山市的主教，以及七月十四日被祝聖的廣東省汕頭市的主教。這兩次非法祝聖主教的儀式，都有公安部隊的支持，他們向信譽良好的主教施加壓力，逼使他們出席和進行非法祝聖。羅馬教廷分別就這兩次非法祝聖

發表聲明，宣布按照《聖教法典》第一千三百八十二條，將兩位非法祝聖的主教施以絕罰。北京官方對教廷的聲明反應強烈。

後來，國家宗教事務局於海南省海口市舉行檢討會議，並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作出以下決定：指引「一會一團」的天主教會落實第八屆全國天主教代表大會的精神，加強教育方面的工作以保障教會行政的自主和獨立，實施民主管理的教育，並組織六次培訓課程，來加強一千多名神職人員的培育。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中的一篇主要文章，解釋「為何中國共產黨能夠團結信教群眾」。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葉小文，自二零零九年以來，他已經離開了國家宗教事務局，成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顯然他對官方的宗教政策仍然有影響力。他的繼任者王作安於九月二十八日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個新聞發布會時表示，「中國願意在兩個原則的基礎上，與梵蒂岡進行真誠的對話」。幾

個星期前（二零零一年七月四日），國家宗教事務局宣布了新的「中國天主教會堂區神父任命的規範」，並即時實施。很明顯，這是一個國家對傳統中由《聖教法典》規定、世界普遍認為是屬於教會內部事務的事情作出干預。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新的報告，指某些「地下」神父遭到迫害，尤其是在河北省北部。當局將他們帶走，並試圖強迫他們加入愛國會。另一方面，當局除了保證他們和他們的家庭能獲得大量的個人利益外，還提供特權和金錢資助，促使神父和主教接受官方的「更有利於教會發展的」宗教政策。當局透過多次的研討會、研究會，向神職人員施加雙重壓力，並在中國天主教的官方雜誌上發表書面意見，試圖以神學維護「自選自聖」的政策。

在這樣的氛圍中，一些主教可能會開始覺得，若果他站在中國政府的一方，為他可能更有利，因為中國政府確保中國天主教即使沒有羅馬

的支持，仍會繼續擴大。事實上，這些主教往往發現自己被他們的司鐸、修女和信眾孤立，因而不能有效地進行他們的牧民工作。

二零一二年：依然陰霾密佈

二零一二年剛開始，在一月九日即有國家宗教事務局宣佈整理神職人員的紀錄，以及落實宗教場所財務管理的措施。二零一二年四月有兩位新的主教被祝聖，他們分別是四川省南充市主教陳功鰲（四十七歲）及湖南省長沙主教屈藹林（五十一歲），他們都得到羅馬教廷和中國官方機構的批准。但在他們的擢升典禮的出席者中，也有一些在非正常情況下被祝聖的主教。六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愛國會在北京全國修院主辦神學研討會，愛國會的其中一位副秘書長周永智聲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精神是中國教會獨立自辦原則的思想基礎。另一位副秘書長王懷茂在這次會議上宣稱，中國天主教在聖神的默啓下，在教會

建設和牧靈福傳實踐中，提前十餘年（即一九五零年代）對教會進行了改革。這就是說，愛國會於一九五七年成立，第一個未經教宗批准的主教於一九五八年被祝聖，按照他的說法，中國的這些舉措為梵二會議「跟上時代」的精神，起了實踐的示範和墊腳石的作用。

另一次嚴重衝突發生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星期五），岳福生神父在沒有教宗的任命下，被非法祝聖為哈爾濱（黑龍江）的主教。在事件前數天，宗座萬民福音傳播部曾發表一份聲明，警告這單方面的行動「將會使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團體衍生紛爭、撕裂、緊張」。該聲明引述教宗信函（第九節）指出「中國和世界其它國家一樣，政府當局關注那些將發揮地方天主教會團體領導和牧人重要作用、並在社會中發揮影響的人選，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應該緊記，「聖座也特別關注主教的任命，因為教宗任命主教，是教會合一和聖統制共融的保障。所以，這事有關教會生命的

核心」。萬民福音傳播部的聲明堅持主教的任命是一個宗教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國際公約也闡明為某一宗教團體任命牧者，是充份行使宗教自由權的一個構成因素。」

不到二十四小時後，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於七月四日發表強硬聲明，聲稱梵蒂岡的警告「態度極其蠻橫無理，令人震驚」。岳福生的擢升典禮按原定的計劃進行，羅馬教廷也無可奈何，但宣稱他已自動受到《聖教法典》第1382條所訂定的制裁，並不具有管理黑龍江省的司鐸和天主教社區的職權。然而，官方的說法得出結論：宗座相信中國當局希望與聖座對話的意願，同時不鼓勵任何危害對話的行動。

不久之後，馬達欽神父（四十五歲）於七月七日在上海教區徐家匯大教堂祝聖為該教區的輔理主教。雖然他的任命獲雙方認可，但這個儀式所帶來的緊張局面證明其潛在的嚴重後果。在擢升典禮後，馬達欽主教被當局帶走，並軟禁在

佘山修院，不能執行他的主教職責，亦無法接見任何人。

現在我們可以有甚麼期望？

在過去的五年內，教宗信函對中國天主教團體的生活帶來了積極的影響，這可以由眾多在牧民和福傳方面響應教宗的指引的措施得到證實。在「信德年」，我們預計這些工作將成為教友、神父、修生、修女培育的重要環節。

然而，明顯如果政府堅持擢升更多非法的主教，中國天主教會有可能成為由政府領導的「國家教會」，從而改變她的本質。此外，在上海教區發生的危機暴露了中國官方長期在宗教政策上含糊其辭。

馬達欽主教在上海公開宣佈辭去愛國會的職務（他從來不主動參加）以專注於他的牧靈職責，引發了政府的震怒。多年來的情況已經顯示，一個主教或一個合格的教會成員必須是愛國會的成

員，才會得到官方的接納。這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上海官方認可的主教金魯賢已經九十七歲，他在五年前曾公開讚賞教宗的牧函，但他補充說這二十多年來在上海的經驗中，「愛國會從來沒有干涉我的事務。」而現在馬主教被軟禁的事件，證實愛國會確實「干涉」上海主教的職務。

在最近的幾十年中，這種模稜兩可的政策助長了許多一心維護信仰完整的「秘密」的社區。聖父除了指出「秘密狀態並非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還補充說：「在不違背不可放棄的信仰原則及教會共融的前提下，教會接受政權當局的認可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第7.8節）

另一方面，由於各地的情況不一樣，教宗並沒有提供具體的指示，而是容許主教按各地的情況自由判斷。河北省保定教區的事件，反映出尋找可行的解決方案的困難：地下教區助理主教安樹新遭警方拘押十年後「回到地上」，他在國家宗教事務局的強大壓力加入愛國會，隨後接受任命

成爲正式的教區主教，此舉在當地社區造成了進一步的分裂。

正如教宗信函中所譴責的，「時至今日，上述機構的認可，仍然是衡量一個團體、一個人或者一個宗教場所是否合法，即官方的標準。由此，導致了神職內部和教友內部的分裂。」（第「」節）這是嚴重的問題，因爲愛國會章程「所宣稱的宗旨，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與天主教的教義無法調和，這教義自古代的信經，就已宣認教會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第7.6節）

斐洛尼樞機主教去年成爲教廷萬民福音部部長，在最近的一次接受《二十天》雜誌訪問（二零一二年五月）時表明，中國共產黨或政府官員在主教任命的事情上，應當開放地接受教會所定的正確標準。他解釋說「這不是出於教宗的命令」，因爲主教既爲宗徒的承繼者，教會就期望他們忠於教會的教義。當然，作爲公民，他們也需要忠

於自己的祖國，「凱撒的歸凱撒，但不應從天主那裡拿走屬於天主的東西。」

基於傳統的君主專制政治和共產主義的無神思想，中國可能不會輕易接受政教分離的原則。此外，從生活的經驗中可以得知，民族自豪和捍衛主權等思想，是多麼容易因各種政治原因或個人利益而被利用作為藉口。

據一些觀察家認為，在過去數年，某些聲稱是對抗外國勢力入侵的極左思想，為教會產生消極的影響。最近中國和國外的媒體都給予充分的證據，顯示毛澤東的革命方法正在復興，使一些人認為中國永遠無法克服這意識形態。經驗極富學者馬雷凱曾說過：「我們不能改變共產主義制度，但制度將會改變。」

隨著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黨代表大會將於十一月八日在北京召開，當地的氣氛似乎希望遠離左傾思想。人們衷心期望在未來數十年治理這個偉大國家的新一代領導人，會實施社會正義，尊

重少數民族和宗教群體的政策，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艱苦道路上的明燈

斐洛尼樞機主教為《鼎》季刊撰寫了一份發人深省的反思，值得我們注意。在教宗信函發佈的五年後，檢討目前的情況，為教會生活和福傳事業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指出中國教會迫切需要實現團體內的合一。樞機主教也以他過往作為梵蒂岡「中國教會研究任務」主任的豐富經驗，指出目前與中國當局交涉的困難。他在到訪北京的過程中，親眼見到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他絲毫不掩飾他的佩服。但他更重視他所認識的天主教的優秀質素，「本人多次與中國的朋友交談，他們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在自己的家鄉裡卻因著自己是教友而蒙受羞辱，可是在其他地方卻受到尊重和欣賞！」他解釋說：「有一次，一位年長的中國神父對我說：『在中國，我們天主教教友所得

到的自由，只不過是籠中鳥的自由！」

斐洛尼樞機相信，中國當局不能繼續對眾多中國公民的呼聲充耳不聞，並指出羅馬和北京之間的和解，對中國和教廷都有利：「展開新方式的對話的時機到了嗎？這對話方或甚至可以更爲開放，更爲對等，以至善意、信任和彼此尊重不爲私益所破壞。」事實上，教宗在他的信中公開宣稱，教廷「始終準備著協商，這爲克服目前的困境是必需的。」這已是我們能夠期望的最權威、明確的聲明，「冀願中國知曉，天主教會熱切希望可以再度按她的專能，爲中國天主教友、以及所有中國人民的利益奉獻謙卑無私的服務。」（第一節）。

斐洛尼樞機建議，爲恢復一度中斷的對話，應當設立一個「高層」的雙邊委員會，以處理「共同關心的問題」。當各方都在尋求大眾的利益時，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應是一個絕對的障礙。樞機以兩個例子說明：「例如聖座和越南找到了雙方

交往和發展友好關係的模式。北京和台北之間不是也設立高層次的特定委員會來處理相關的問題嗎？難道不能盼望聖座和中國也可進行適當和坦誠的對話嗎？」

斐洛尼樞機在其結論中表達這樣的希望：「教宗致中國聖職人員和教友的信仍是有效的。……這信既可成爲在中國教會內的對話的起點，又可促進聖座和北京政府之間的對話。」

我們作爲信友，應當爲這件事祈禱。讓我們以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建議的話，呼求在上海佘山附近備受恭敬的耶穌的母親：「希望之母，在聖週六黑暗中的，你以始終如一的信心，迎接復活節的來臨。請賜你的孩子能在任何時候，即使是最黑暗的時候，仍能辨別天主愛的臨在的痕跡。」